

辽 金 元 明 南 梁 陈 魏 北 周 隋 南 北 旧 新 旧 新 辽 金 元
史 史 史 史 齐 书 书 书 齐 书 书 史 史 唐 唐 五代 五代 史 史 史 史

文白对照 二十四史

精 华

晋 书（一）

主编 廖盖隆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毛泽东读《晋书》

毛泽东读《晋书》的故事，可谓感人至深。他在重病缠身时，用颤抖的手写下1975.8再阅，1975.9再阅的手迹就是留在了《晋书》的封面上。

《晋书》，唐房乔即房玄龄撰，共一百三十卷，计有本纪十卷，志二十卷、列传七十卷、载记三十卷，记载从晋武帝泰始元年至恭帝元熙二年（256—420）一百五十六年的史事，诸志所载典章制度则上承汉末。书中虽多矛盾、疏漏，但仍是研究晋史的主要依据。

《晋书》取材广泛，内容丰富，叙事详尽，是一部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史学著作。这是《晋书》的一大优点。唐代创官家修史，在图书资料的汇集和人力的组织上都要优于私家。前文在叙及《晋书》的史料来源时曾提十八家晋史及其他史著，这在《晋书》中也有反映。比如在《晋书》本纪中，追溯了曹魏末年司马氏专政和代魏的历史，可以弥补《三国志》的不足。



在《晋书》列传中，保存的珍贵史料更多，足以反映两晋时期社会矛盾的全貌以及经济文化发展的情况。同时，列传中多载有原始的历史文献，如《禹贡地域图序》（卷三十五）、裴彪的《崇有论》（卷三十五）、刘寔的《崇让论》（卷四十一）、挚虞的《今尺长于古尺论》（卷五十一）、陆机的《辨亡论》（卷五十四）、郭璞的《刑狱疏》（卷七十二）、鲁褒《钱神论》（卷九十四）等，对于说明晋代的社会风俗，都是极重要的文献。再比如五胡十六国这段历史，在《晋书》以前虽有《三十国春秋》、《十六国春秋》等著作，但原著久已失传，今天所能看到的，只是后人的辑本，因而研究这一段历史就不能不留意《晋书》三十载记。此外，唐以前虽有为数众多的晋史著作，但《晋书》取代这些著作后，大多都已失传，流传到今的全本几乎没有了，所以在保存史料方面，《晋书》无疑是有很大成就的。

毛泽东在阅读《晋书》时，曾在此书封里附记批注：一九七五年八月，阅第五十至六十卷，再阅第三十四卷《羊祜传》、《杜预传》；九月阅第七十九卷《谢安传》、《谢琰传》、《谢光传》。1975年8月—9月，这个时间告诉我们，这是毛泽东临逝世的前一年整。当时毛泽东已届八十二岁高龄，且有诸多重疾在身，特别是他的眼睛，当时已做了白内障切除手术，医生已明令禁止他再看书。既便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，他仍在孜孜不倦地阅读史书，而且将日程安排的如此之紧。我们也可由此一窥毛泽东对《晋书》的喜爱。



毛泽东在阅读《晋书》卷五十《郭象传》，曾在第8—9页上批注：郭象无行。郭象(252—312)是西晋有名的哲学家，清淡派人物。其《庄子注》是在向秀的《庄子注》基础上增改而成，在阐扬老、庄道家思想方面有些见解。毛泽东认为“郭象无行”，主要在两个方面。一是以清高名，以清淡自娱，最后还是“任职当权”，势倾内外，一改淡泊功名之素论。可见其言行并不一致。再就是在学术上有剽窃向秀《庄子注》之嫌。在卷五十《庾纯传》第9页上批注：此公骂也。在卷五十五《潘民传》第17—19页上，也有：道家言、志氏等批注。他谈卷五十六《江统传》时，更是感慨万千。他在第七页上批注曰：迁亦乱，不迁亦乱。在封建时代非乱不可。千数百年后，得化为不乱始辑耳。江统是西晋人。初为山阴县令，后历任太子洗马、尚书郎等。西晋元康八年，讨伐作乱的齐万年，平息了少数民族氐、羌，捉住了氐族统帅齐万年。江统认为应趁早杜绝其根源，于是建议朝廷把氐羌等少数民族迁往更西边的地方。这个建议未被采纳，不到10年，少数民族果然进攻中原。时人都佩服江统的远见。但毛泽东不以为然，在他看来，少数民族并不是同中原地带对立，而不在于迁不迁走。批注没有说明为什么，但说：“千百年后得化为不乱”，大概是说我们今天的民族大团结，少数民族同汉族和睦相处，关键在于我们的民族政策好。而江统诸人以大汉民族主义的民族观处理民族矛盾，纵能一时奏效，时间一长则非乱不可。所以，毛泽东在党

的民族工作中，总是强调要克服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，重点在前者。

王羲之(303—361)，东晋书法家、文学家。字逸少。官至右军将军，世称王右军。善文章，所作《兰亭集序》，论述他与谢安等41位名士宴集山阴兰亭盛况，即事抒情，文笔清新疏朗，情韵绵邈，为人传颂。原有集十卷，已佚。明人辑有《王右军集》。

毛泽东对儒家的圣贤之说，不以为然。《王羲之传》记载：殷浩率军北伐失败，复图再举北伐。时任右军将军的王羲之写信给会稽王。陈述殷浩不宜北伐的道理并论及时事，其中有“《传》云：‘自非圣人，外宁必有内忧。’今外不宁，内忧以深……求之于今，可得拟议乎？”等语，毛泽东读到这里，批注道：虽圣人亦如此，况无圣人耶！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及治国之道。毛泽东擅长书法，爱读《王羲之传》，亦在情理之中。

毛泽东在1966年3月的一次谈话中，曾说：司马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历来说他坏，我看有几乎比曹操高明。不过，在历史上，司马懿的名声远逊于诸葛亮，大约是同为“相”，一则谋人之国，一则鞠躬尽瘁之故。在《三国演义》里，司马懿则近乎一个丑角。不过毛泽东读史是不会受俗议和感情支配的，他总能于人无见识处有见识。

毛泽东说陆逊坚守不战，按剑示强于部下，“此司马懿敌孔明之智也”。这里指的，便是诸葛亮最后一次伐魏时，司马



懿看出他远道而来，利在急战，采取“以候待变”的战略。于是“亮数挑战，帝不出”。《三国演义》中有关描写，甚至说诸葛亮为了激怒司马懿出战，派人送来妇女衣物以污辱司马懿，司马懿却高高兴兴地接受了，手下将领按捺不住，他也反复劝说。《晋书·高祖宣帝纪》说得更有意思。诸葛亮送来妇女衣物后，“帝怒，表请决战，天子不许”，于是派辛毗杖节前来节制司马懿。“后亮复来挑战，帝将出兵以应之，毗杖节立军门，帝乃止。”这时，诸葛亮看透了司马懿的用心，对手下人说：他本来就不想同我交战，之所以上表请战，乃“以示武于其众耳。”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他若真想打仗，何必不远千里向天子请战呢？的确，司马懿这一招，既保全了不甘受污辱的面子，又达到了以静制动、以稳待变的军事目的。正像毛泽东说的，这一手，确实“高明”。结果，诸葛亮病死五丈原，蜀军不战自退。

据《晋书》卷三《晋武帝纪》载：晋武帝司马炎（236—290），字安世，河内郡温县（今河南省温县）人。公元265年8月，继父亲司马昭任晋王、魏相国，同年12月即帝位。庙号世祖，谥号武帝。

司马炎即位后，消灭了南方的吴政权，统一了全国。频布“户调令”，用强制兼鼓励的方式使农民努力耕作，用承认又限制的方式缓和大族与农民的矛盾，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。统治后期，司马炎自满享乐，以司马氏为首的大族奢靡之风泛滥。晚年，广封宗室，希望以此求得晋王朝长治久安。事

与愿违,从客观上推动刚刚统一的国家又一次进入了战乱状态。毛泽东曾读过此传,并对晋武帝司马炎的历史功过作过客观的分析和评价。

《晋书》卷七十九《谢安传》记述了东晋政治家谢安的平生传略,据该传记载:

谢安(320—385)东晋政治家。字安石,陈郡阳夏(今河南太康)人。出身士族。多年隐逸林下,年40余始出仕。孝武帝时任宰相。太元八年(383年),前秦苻坚亲率80多万大军南下伐晋,江东大震。他镇定沉着,遣弟石、侄玄等力拒,获淝水之战全胜,乘机收复洛阳及涂、青、兖、豫、梁等州。后司马道子执政,谢遭排挤,出镇广陵(今江苏扬州),不久还都病故。

毛泽东曾于1975年9月“再阅”该传。第一次阅读时间不详。很明显,毛泽东对谢安的潇洒、超脱,既深谋远虑,又镇定自若的风采颇为欣赏。





《晋书》概论

《晋书》，唐房乔即房玄龄撰，共一百三十卷，计有本纪十卷，志二十卷、列传七十卷、载记三十卷，记载从晋武帝泰始元年至恭帝元熙二年（256—420）一百五十六年的史事，诸志所载典章制度则上承汉末。书中虽多矛盾、疏漏，但仍是研究晋史的主要依据。

—

《晋书》一百三十卷，始修于唐太宗贞观十八年（644），至二十年修成。按朝代顺序，《晋书》在二十五史中列第五，但从成书年代看，《晋书》成于唐初，在宋、齐、魏乃至隋书之后，距西晋灭亡已有三百多年，距东晋灭亡也有二百多年。

《晋书》题为房乔撰，实际上是一部集体撰制的官修史书。在我国史籍的编撰史上，唐初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。唐代以

前，史书的编撰是官修和私人编撰并存而以私家著述为主，私家编撰的史书往往不能完全符合当权统治集团的需要，甚至某些奉诏所修的国史，也由于修史者不尽站在以皇帝为代表的最高统治集团一边，自觉不自觉地触及乃至危害其统治利益，因此在隋文帝统一全国后，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，在史学方面加强了控制，开皇十三年(593)下诏：“人间(即民间)有撰集国史、臧否人物者，皆令禁绝。”(《隋书·文帝纪》)这是明令禁绝私人撰集国史。唐朝政治上的再度统一，要求思想文化方面有相应的措施，扫除分裂割据的痕迹，树立统一的历史观。私人修史远远不能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。于是在贞观三年(629)设置专门的修史机构，从而把官修国史制度化，完成了国史从私修到官修的过渡。《晋书》的编修正是这种官修史书背景下的重要产物。

《晋书》的撰稿人很多，参加编写工作的共有二十二二人。其中房玄龄(即房乔)、褚遂良、许敬宗三人为监修，即担任主编；此外，唐太宗李世民还亲自写了宣帝纪、武帝纪、陆机传、王羲之传等四篇论赞，所以《晋书》旧称“太宗文皇帝御撰”也是有道理的。

二

《晋书》以其百三十卷的巨制，能在短短三年时间内编成，



除上面提到的编写人员众多这个因素外，另一个因素则是可供直接参考的资料十分丰富。唐朝官修的《晋书》所利用的史料大致有三个来源：一是两晋南北朝时期各家撰著的有关晋朝历史；一为晋朝各帝的起居注；一为杂史文集等史料。

首先是十八家晋史。晋末距唐初已有二百余年，在这一段时间内，研究晋史的学者很多，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和《唐书·艺文志》所载，已成书的不下二十家。唐太宗在《修〈晋书〉诏》中称：“前后晋史十有八家”。但究竟是哪十八家，到现在已很难确定，一般通行的意见，是指：晋陆机的《晋纪》，王隐的《晋书》，谢沈的《晋书》，干宝的《晋纪》，邓粲的《晋纪》，孙盛的《晋阳秋》，虞预的《晋书》，曹嘉之的《晋纪》，何法盛的《晋中兴书》，朱凤的《晋书》；宋：徐广的《晋纪》，檀道鸾的《续晋阳秋》，裴松之的《晋纪》，谢灵运的《晋书》；齐：臧荣绪的《晋书》；梁：萧子云的《晋书》，萧子显的《晋史草》，沈约的《晋书》等十八家。此外还有晋：束皙的《晋书》帝纪十志，荀绰的《晋后书》，习凿齿的《魏晋春秋》；宋：刘谦之的《晋纪》，王韶之的《晋纪》，郭季产的《晋纪》；梁：萧统的《东晋新书》，郑忠的《晋书》等八家，也在参考之列。

上述这些史书，体例不尽相同，有的属纪传体，有的为编年体；所记年限也不尽一致，有的只写到西晋灭亡，有的仅东晋一朝史事，而最使唐初统治集团深感不满的，是没有一个尽善尽美的本子为他们所用，所以唐太宗要批评说“（臧）荣绪烦



而寡要，行思（谢沈）劳而少功，叔宁（虞预）味同画饼，（萧）子云学埋洄流，处叔（王隐）不预于中兴，（何）法盛莫通乎创业”。至于干宝、陆机、曹嘉之、邓粲只不过略记帝王，檀道鸾、孙盛、徐广、裴松之等人虽然富有才华，然而“其文既野，其事罕有”。于是下诏重修。唐朝官修的《晋书》即以臧荣绪的《晋书》为底本，参考其余史料，重新编写而成的。

其次是晋朝的起居注。晋朝的史官是著作郎兼任的，初隶属于中书省，晋惠帝时，又设置著作郎一人，称为“大著作”，专掌史任，同时设辅助性的佐著作郎八人。著作郎掌起居集注，记录皇帝言行和当朝大事。因此晋朝的起居注很多，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记载，就有二十三种，共五百五十七卷，这也是修《晋书》的重要参考资料。

再次是杂史文集，包括有晋朝旧事、五胡十六国史及杂说三种。关于晋朝旧事的有《晋朝杂事》、《晋宋旧事》、《晋要事》、《晋故事》、《晋建武故事》、《交州杂事》、《晋八王故事》、《桓玄伪事》、《晋东宫旧事》等书。五胡十六国的国书三十家，及崔鸿的《十六国春秋》等书。杂说如傅畅的《晋诸公赞》、郭颂的《魏晋世语》、刘孝标《世说新语注》，祖冲之的《述异记》，刘义庆的《幽明录》，干宝的《搜神记》，东阳无疑的《齐谐记》，许善心的《符瑞记》等书。

正是由于唐朝官修《晋书》取材宏富，加之编纂得当，所以明显优于以往各种晋史。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他的史学



名著《史通》中说，自从唐本《晋书》出现后，“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，竞从新撰者焉”。唐朝官修《晋书》能够取代旧有的十八家晋史，得到广泛流传，说明它的编写是成功的，也自有其存在的价值。

《晋书》系叙述两晋（西晋、东晋）时期一百五十五年（265—419）的历史。总括起来，它有如下特点和价值。

首先，从编辑分工合作情况看，《晋书》是官修史书中组织分工比较合理、能够发挥各家专长的一部史学著作。在《晋书》的修撰过程中，主持监修的房玄龄等人对组织分工作了比较合理的安排，因其所长，分工撰录，便于发挥个人专长，然后集合各人的专长，合成一书。这在官修史书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。后代官修史书在这方面是赶不上《晋书》的。

其次，从编辑体例来说，《晋书》在古代史籍中是体例比较合理并有所创新的一部史学著作。《晋书》的编辑体例，基本上沿袭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宋书》、《南齐书》、《魏书》的体例并加以发展。有本纪、列传、志书和载记，发挥了纪传体史书固有的特色。本纪中的宣帝、景帝、文帝三纪，追述西晋建立前曹魏后期司马氏专权的历史，说明晋朝帝业的开创始末。这三个人虽没有帝号，陈寿《三国志》也未立传。干宝《晋纪》创立三帝纪，唐修《晋书》承袭这种做法，并对以后的《金史》创立《世纪》产生了影响。

《晋书》列传的编次，很是得体。例如陶潜死于刘宋，为了



褒奖他心不忘晋，也为他立传；桓温本有争晋的阴谋，所以他的传不列入桓彝之下，而是与王敦、桓玄同入叛逆传中。七十卷列传，共列入七百七十二人，除按时代先后编次外，还有很多合传。其中有按高门士族合为一传的，有的多达十人以上，如桓彝子孙十六人、安平王司马孚子孙十三人、王湛子孙十二人、陶侃子孙十一人，分别合为一传。这种写法反映了当时士族的强盛和时人对门第观念的重视。有的则按传主的共同特点合传，如阮籍、嵇康、向秀、刘伶等人合传，是因为他们都具有“其进也，抚俗同尘；其退也，餐和履顺，以保天真”的特点。比如将徐广、陈寿等十二人合为一传，皇甫谧、束皙等四人合为一传，则是因为他们都是历史学家、考古家。又比如卷五十九的八王合为一传，若以世次论，他们根本不可能合为一传，但因为他们是导致西晋灭亡的“八王之乱”的罪魁，所以也合为一传。

《晋书》中载记的运用是最著特色的体裁。载记是用来记叙新市、平林、公孙述等的割据势力，有些类似于《史记》的世家。《晋书》写的是统一皇朝的历史，对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历史记载，自然贯彻着一种统一的思想。十六国都在中土，又不受晋封，势难以按照《史记》的世家那样处理，因为世家所列诸侯皆由周王室分封而承认周王室为天下共主，这样就只有援引“载记”之例，分国记述前赵、后赵、前燕、前秦、后秦、后蜀、后凉、后燕、西秦、北燕、南凉、南燕、北凉、夏等十四个政



权。三十载记，只称“僭伪”，不强调“华夷”，正是唐太宗摒弃华夷之辨的狭隘民族偏向，实行“爱之如一”的民族政策的思想的直接体现。

再次，从史料的角度看，《晋书》取材广泛，内容丰富，叙事详尽，是一部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史学著作。这是《晋书》的一大优点。唐代创官家修史，在图书资料的汇集和人力的组织上都要优于私家。前文在叙及《晋书》的史料来源时曾提十八家晋史及其他史著，这在《晋书》中也有反映。比如在《晋书》本纪中，追溯了曹魏末年司马氏专政和代魏的历史，可以弥补《三国志》的不足。在《晋书》列传中，保存的珍贵史料更多，足以反映两晋时期社会矛盾的全貌以及经济文化发展的情况。同时，列传中多载有原始的历史文献，如《禹贡地域图序》（卷三十五）、裴颢的《崇有论》（卷三十五）、刘寔的《崇让论》（卷四十一）等，对于说明晋代的社会风俗，都是极重要的文献。再比如五胡十六国这段历史，在《晋书》以前虽有《三十国春秋》、《十六国春秋》等著作，但原著久已失传，今天所能看到的，只是后人的辑本，因而研究这一段历史就不能不留意《晋书》三十载记。此外，唐以前虽有为数众多的晋史著作，但《晋书》取代这些著作后，大多都已失传，流传到今的全本几乎没有了，所以在保存史料方面，《晋书》无疑是有很大成就的。

《晋书》尽管有较完备的体例和充实的史料，但也有其不足之处。

首先值得注意的是《晋书》中所表现的孝道伦理和天命论思想。这还得从魏晋以来的政治、文化思想的变化说起。魏晋以来,由于政权更替频繁,儒教的伦理纲常,尤其是忠君思想,已被大大削弱了。孝道被统治者死死抱住不放,当成维系其统治的重要手段,所以,从南北朝的各史开始,有关“孝义”、“孝行”或“孝友”的类传频频出现。到了唐朝,儒家学说逐渐居于正统思想地位。在总结前王得失与进行伦理说教两者之间,《晋书》的修撰者们更多地从后者着眼。因此,宣扬伦理纲常,用以“敦励风俗”,突出孝道,就成为修撰《晋书》的基本思想。这可以说《晋书》的指导思想有别于唐初所修其他各史的一大变化。在《晋书》中,不仅专门为“孝友”产传,就连其他列传也刻意突出孝道。书中所采的“孝悌名流”,有些被后世奉为“孝”的典范,列入“二十四孝图”,足见其影响之深远。另一方面,为了维系和神化皇权,《晋书》还注入了强列的天命论思想。监修房玄龄按照唐太宗的旨意,明确肯定“王者,必有天命”的命题。因此书中多采摘一些荒诞的神怪故事,“以广异闻”。如《成恭杜皇后传》写皇后少有姿色,长大了还没有牙齿,“帝采纳之日,一夜齿尽生。”《干宝传》说他父亲的一个婢女,幽闭墓中十多年,后来竟然又复苏、嫁人,并且还生儿育女。这种宣扬鬼神怪异,因果报应的文字,对于讲究客观真实的历史著作来说,是极其有害的。

《晋书》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,是它的前后矛盾、疏漏脱



落之处。由于是众手修书,参加的人的水平参差不齐,撰成后又未经精心通纂,因而书中存在一些前后矛盾,互不照应之处。至于书中关于人名、地名、官职、时间、地点的错误及前后不一之处,更是不胜枚举。

尽管有上述不当之处,但《晋书》毕竟是在广泛汲取前人成果和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撰成的,应该说是成绩多于缺点,在我国古代史籍中是一部具有较高水平的史书。加上修撰者多为文学之士,魏晋以来以至唐初,盛行四六骈体文,修撰诸公辞藻华丽,“竞为绮艳”,这对于专门的史学著作讲究笃实的学风来说,固然是不相宜的,但对于一般读者,通过文白对照的形式,展现其中的部分篇什,不是既可以温习一点两晋史实,又可以欣赏到初唐学子的“绮艳”文风么?!

三

我们在这里提供一些有关两晋时期的政治、经济、民族、文化的背景知识可能对了解晋史会有一定帮助。

政治方面:两晋时期政治的一个突出的特点,就是门阀政治(又称贵族政治)。所谓“门阀政治”就是由世家大族把持朝政,出身低微的人是无缘进入官府的。本来,在西汉时期,由于跟随刘邦起事的多为出身低微之徒,后来当上了高官,形成了所谓的“布衣卿相之局”。东汉时期地方世家大族势力虽有



所发展,但由于两汉时期采取由社会基层组织推举的“察举”和“征辟”的途径选拔官吏,一些出身寒门的人如果德才兼备还是可以入仕为官的。东汉末年的社会大动荡,摧毁了社会基层组织,原来的“察举”和“征辟”不能有效的进行,曹魏建立后,就实行“九品官人法”,依据人物的品行定为九等,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,“盖以论人才优劣,非为史世高差”。迨至西晋,当权者司马氏本东汉巾叶以来的世家大族,西晋政权所依靠的也是一些世家大族。此时虽继续采用“九品官人法”,但掌握评选标准却是世家大族,以致形成“上品无寒门、下品无士族”的局面。东晋偏安江东后,门阀政治更是发展到极致,且出现二大变化。其一是地方握有兵权的大族显要往往左右朝政,晋初的“王与马,共天下”就是很好的说明,其后的桓氏家族也是如此。其二是南北士族的结合。东晋所在的江东本是三国时吴国的地盘,与曹魏打击豪强,任人唯才不同,孙吴政权所依据的却是世家大族的势力,等到晋司马氏带领北方士族进入江东时,那里的士族力量已相当强盛。《晋书·王导传》上说:“顾荣、贺循、纪瞻、周璠,皆南土之秀”。正是在南北世家大族的共同扶持下,东晋偏安政权才得以延续。门阀政治终东晋一世,直到刘裕取代东晋建立宋朝,门阀政治才算走到了历史的尽头。

两晋的门阀政治导致了许多社会现象和社会矛盾。首先,是统治阶级的奢侈和对门第观念的重视。门阀政治和门